

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

——以“《废都》现象”“《秦腔》视阈”与“《山本》问题”为中心

陈思广

【摘要】“《废都》现象”“《秦腔》视阈”“《山本》问题”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中三个重要抓手,本文以之为中心,探讨其长篇小说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在《废都》批评中,呈现出誉毁相参,查禁与再思重评的曲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批评者前后迥异、判若两人的批评立场与批评姿态,令人不禁感慨批评者的风骨。在《秦腔》批评中,传统(乡土)文化与叙事艺术是最主要的两个既定视野,但作品的世界性因素却缺乏贯通性的追索,说明我们的研究视阈有待进一步打开。《山本》问题,暴露出贾平凹创作中早已存在的顽疾与读者的时代病。对于前者,迫使我们思索批评的意义;对于后者,告诫我们需要健康的批评生态,需要负责任的文学批评,需要实话实说,真诚坦言的文学生态。

【关键词】《废都》现象;《秦腔》视阈;《山本》问题;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

【作者简介】陈思广,男,新疆库尔勒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及作家作品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2019.6.123~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7BZW153)。

自在《文学家》1984年第5期发表第一篇评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专文《〈商州〉得失谈》至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研究已走过虽有坎坷但却收获颇丰的35年,这不仅是因为贾平凹的勤奋与努力使人们不断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他不时出版的长篇新作上,更是因为贾平凹在其系列长篇小说中所展现的思想艺术使人们不由地及时聚焦在他那一本本仍散发着墨香的长篇文本中。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9年3月30日,以“贾平凹”和“长篇小说”同时为主题的研究论文826篇(含硕博论文133篇);以“贾平凹”“长篇小说”同时为关键词的“论著”约71部。大量的高水平论著不仅显示着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的热度,也推动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广度与深度。虽不能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研究代表着当代文学的研究高度,但它所体现的前沿性与深广度,却在当代作家的创作研究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它所生发的现象与问

题,不仅具有个案意义,也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全面地探讨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承载的容量,但如果我们以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中三个重要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十年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显现的主要问题为抓手,即以“《废都》现象”“《秦腔》视阈”以及“《山本》问题”为中心,探讨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时,它所显露的问题与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更为集中,而且同样具有更为鲜明的靶向意义。

一、《废都》现象

《废都》是贾平凹1993年出版的一部颇具争议性的长篇小说,也是贾平凹唯一一部出版不久即被明令禁售但后来又发文解禁的长篇小说,也因此,在《废都》的批评接受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大热,大跌,再回暖的接受轨迹,呈现出誉毁相参,查禁与再

思重评的曲折过程,这一仅在《废都》批评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我们称之为“《废都》现象”。

1. 誉毁相参与查禁 1993年7月,《废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借助媒体的炒作与推宣,《废都》一问世,即引发了文坛新的轰动效应,评论界也对贾平凹的这一新作及时跟进,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肯定者认为,“《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20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1]“《废都》是一部写世态、人性、心迹的文人小说,这无论是从它所反映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它采取的表现形式上看,都是这样。它不仅撩开面纱写了城市的角角落落,而且敞开心扉写了自己的忧忧怨怨,这在贾平凹的创作中是第一次,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也不多见。”^[2]“《废都》‘表现了当代文化人的矛盾和彷徨,困惑和思索,颓唐和沉沦’。虽然‘主要是写当代文人的一种负面状态’,但‘在如实地表现生命状态这一点上,它可能超越了当代所有的长篇小说’^[3]。《废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文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溃败史,一个全景式的后现代的精神现象学空间’^[4],‘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精华的继承吸收和对世界现代哲学思维成果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观念’的小说^[5]。否定者认为,“我必须指出,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沉溺于自我导致了他对所欲表现的对象的垄断,实际上也导致了艺术对象的丧失——尽管他想的是要给城市写一本书,可写出来的却是某个‘名人’的苦难;尽管他试图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是那‘安妥灵魂’的强烈自慰心理,却夺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情节、语言、人物的自在性,其结果,与其说产生了一件艺术品,不如说产生的乃是关于他个人精神梦魔的一份笔录。”^[6]“《废

都》是仿拟性作品。它表现了一种文化错位。它的性描写在完成了煽情任务后销融了美感魅力。书中的女性形象之所以不堪品评,是因为作者误解了女性。‘废都意识’并未升华为深沉的社会批判。”^[6]“《废都》,作为贾平凹创作生涯的关捩点,在艺术上算是走了一通‘败笔’。”^[7]更有甚者认为,“《废都》径直地投合了文化大众阴暗而卑微的心理,从中我看不出作者对生命的正视、对人生的尊重,在这部以‘废都’标题、貌似有历史感的小说中我也感觉不到作者对历史真义的体味与敬畏。人、性爱、情感与斗争,在贾平凹手中都变成了一种肮脏的玩弄。”^{[8]([1])}当然,还有一些论者对《废都》进行了理智的分析,但总体来说,否定的声音远大于肯定的评价,特别是作品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庄之蝶及其所流露的知识分子精神滑坡、道德沦丧的精神世相,以及性描写背后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噱头和叙述上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使评论界对于《废都》的好评几乎被差评所淹没。1994年1月20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根据新闻出版署的指示,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了《废都》^{[9]([369])},一些人甚至推波助澜、落井下石^①,等。贾平凹本人也因之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虽然之后作品获得了国外的文学奖励,国内间或仍有少量的论者在尝试发声,但“淫书”“颓废”的帽子以及“查禁”的事实,还是让《废都》的研究陷入了长达10年的低谷^②,与之前的大热相比,与同期出现的《白鹿原》好评如潮相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2. 再思与重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学环境的变化,评论界开始检省当初对《废都》的当头棒喝,也试图给出新的评价。对此,陈晓明就深有感触地说:“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和攻击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其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起支配作用”,而贾平凹的《废都》“在很多方面都表示着终结与开始”,是“重新展开的美学追求”。^[10]海外学者鲁晓鹏则将《废都》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结合起来,认为“这部小说可以看

作世纪末众多现象的综合性表征,中国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政治改革依然遥遥无期;金钱崇拜、商品化、腐败、堕落、性享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变革无能为力……‘废都’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政治的荒原”,“没有哪部作品比《废都》更好地契合了这场全国性论争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11]王尧从庄之蝶所隐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入手,重新思考世纪之交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与心理的纠结,继而从思想感情上清理了《废都》之前贾平凹的创作转变和心理焦虑,指出:“从《废都》到《秦腔》贯穿了贾平凹的一条思想线索,即对现代化背景下‘本土中国’的忧思”,“《废都》叙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的‘无根’状态”,“呈现了知识分子无法救赎的可能性”。他还呼吁读者理性地看待《废都》,区分出小说文本的意义、读者的阅读心理、论者阐释的观点以及书商的生意经之间的差异,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思考作者、读者、论者的立场关系。^[12]可以说,此时学者们对《废都》的重评,少了情绪的躁动,多了理性的解析,少了无端的责骂,多了客观的解读,为人们重新解析《废都》建构了新的支点。

2009年7月,《废都》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作品的解禁也渐次带动了“重读”“重评”的回暖。相比于《废都》面世之际极端两极化的倾向与道德审判,虽然仍有少数人固执己见,但总体的氛围还是让批评者的心境平静了许多,开阔了许多,学者们不仅从文学史的视阈予以再审视,还从社会学、哲学、比较文学等多种视角再探其价值与意义,提升了《废都》研究的新高度。如:丁帆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认为,《废都》在满足“截取动荡时代社会生活图景的历史大构架之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性骤变的思想特征”“形式的运用与技巧的雕琢均应服从于思想内容之需求”这三个前提下,“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我启蒙不能完成,中国的改革将会面临思想的迷途。缘此,《废都》才成为了20世纪能够在新文学史

上立得住的描摹灵魂救赎风俗长卷的一部作品”^[13]。朱寿桐也将《废都》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艺术形态转化为文化形态的重要文本,故而《废都》不仅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的标志^[14]。李敬泽撰文将《废都》视作一张关系网,其隐蔽的成就是让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进入了当代小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并对贾平凹的这种洞见表示肯定^[15]。另一些学者则思考《废都》的哲学内涵,指出《废都》深刻地反映了成长意味着死亡,创造意味着毁灭这一人类最基本最普泛且“悖谬”的哲学主题^[16]。还有学者尝试将其与《日瓦戈医生》相比较,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相勾联,探讨其中的新意^[17],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些论述,拓展了《废都》研究的新视阈,标志着《废都》研究重新回归到理性、客观的正常轨道上来。

二、《秦腔》视阈

2005年4月,贾平凹的第12部长篇小说《秦腔》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众多批评者都认为这是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很快于2008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因此,《秦腔》的批评没有像《废都》那样起伏不定,而是一直持续在高热度中运行,不仅使多方位阐释《秦腔》的艺术得失成为可能,也使《秦腔》的研究视阈在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中彰显出特有的深广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新高度^③。这种高热度、多方位、深广度的批评视阈,使《秦腔》的意义获得最大化的展开,也使我们以“《秦腔》视阈”为靶向,探讨其接受的成绩与问题有了现实的依据。

1. 传统(乡土)文化 传统(乡土)文化阐释是贾平凹长篇小说接受研究最主要的既定视野。这一视野在《秦腔》接受上得到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呼应。李星就将《秦腔》定位于“一部视角独特,情浓意近的乡土小说文本”^[18],呼应贾平凹“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19](P517)}的写作初心。陈晓明从后现

代城市与乡村的碎片化来解析《秦腔》，认为“《秦腔》表达的就是它的挽歌，就是它的最后一次的虔敬”^[20]。也有论者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切入《秦腔》的传统与乡土文化的没落，将《秦腔》中夏家最后一次团聚饭的冷场，看作是“暗示着时代变迁中传统家庭和谐观走向衰竭”^[21]。陈思和也指出“《秦腔》正是通过对传统乡土文化式微过程中的各种现象的艺术把握来展开对当下农村社会状况的揭示”，因此，“与其说《秦腔》描述了当下农村经济的衰败，毋宁更准确地说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没落”^[22]。小说中追求现代文明的知识者夏风与酷爱秦腔和传统文化的白雪结合，所生的女儿却是一个没有屁眼的残疾人的设计，隐喻了传统文化的衰败与乡土中国的萎缩。不过，陈思和对《秦腔》代表的传统文化持乐观态度，因为虽然清风街正在走向衰败，传统价值体系也在崩溃和没落，但“同时也包含了其新的生命形态的转化的萌芽”^[22]。《秦腔》用小说记事的方式，艺术地回答了传统文化、乡土中国在新世纪“后改革”时代的生存境况，为学界所普遍认同。

2. 叙事艺术 叙事艺术也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的既定视野。自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起，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就成为批评家关注焦点^[23]，从《浮躁》《废都》的传统说书人叙事，到《土门》“梅梅”的第一人称女性视角、《怀念狼》“我”的主角人物视角，再到《秦腔》“疯子”引生的第一人称视角人物的叙事艺术的阐释，关涉《秦腔》叙事艺术的批评基本囊括了贾氏叙事艺术的理论话语。梳理《秦腔》的叙事艺术视野，可以发现，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叙述者”引生的第一人称视角人物和“密实的流年式”的叙事方式上。

围绕小说开篇“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所确立的第一人称视角人物的叙事方式，学界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方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叙事策略，因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引生是疯子，自然具有不同于正常人的超常思维与别见，选择一个思维奇特的“白痴”似的“叙事人”来达到“超常”的叙述，让虚

实真假纠缠在一起，让叙事达到了不俗的新境界。而《秦腔》中采用的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怪诞、魔幻、夸张以及文化仪礼的穿插等叙事方法很好地达到了“破闷”的叙事效果^[24]；另一方认为，“《秦腔》却无视第一人称的纪律制约，以一种过分随意的态度展开叙事：勇气固然可嘉，但效果令人失望”^[25]，而逻辑上不能自洽是一种分裂，是贾平凹选择第一人称叙述的缺陷。^[24]也有论者辩证地认识到《秦腔》中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叙事越界，将这种“分裂”的形式的原因追根到作者对乡土情感的迷茫的深层意味，“从引生出发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与从全知视角出发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分裂，一直贯穿到小说的结束。作者有的时候对这种分裂浑然不觉……作者似乎也体会到了‘叙述’的分裂，他尝试着将这种‘分裂’以‘魔幻’的方式加以掩饰，在小说中引生化身为老鼠、螳螂、蜘蛛等等，去‘偷听’‘偷看’他无法看到的场景”，然而，“直面惨痛的乡土世界，贾平凹寻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或者说，找不到一种可信的‘理念’来指认‘现实’”^[26]。确实，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叙事常基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和批判以抵抗某种意识形态的精神武器的作用，乡土成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而《秦腔》以第一人称叙述策略，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和乡土的留恋，也给读者带来真实感和亲切感。

《秦腔》在对生活本相的碎片化记录、反戏剧化处理以及日常“鸡零狗碎的泼烦的日子”的朴素记录，促进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变，贾平凹将之称为“密实的流年式”。“就着叙事本身来说，《秦腔》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放弃故事主线，转而不乏琐碎的细节、对话和场面来结构整部小说，这需要作者很好的雕刻细节的能力，也需要作者能很好地控制叙事节奏，《秦腔》做到了。在当代中国，像《秦腔》这种反‘宏大叙事’、张扬日常生活精神的作品，是相当罕见的。”^[27]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突出的主角人物，而是一堆破碎的日常生活，其话语方式、结构、视角等都采用一

种“原生态”描摹的姿态,“在他的小说中开始直面原始的生存经验,并尽力从这种‘看得见’的原始经验出发,同时,对生活、存在保持超然的审美距离,单纯地看,单纯地谛听世界所发出的声音”。“这是一部真正回到生活原点的小说,它是作家内在化了的激情对破碎生活的一次艺术整合,是智慧与睿智对看似有完整结构的生活表象的真正颠覆和瓦解,我们在这幅文学图像中强烈地感觉到了生活、存在的‘破碎之美’。”^[28] 研究者认为,贾平凹这种写法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生活的‘无择取’其实真正意味着对附着在乡土之上的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观念的一种祛除。祛除各种各样的观念,而最大程度地贴近生活的原貌,这是《秦腔》与传统乡村叙事的最大不同。”^[29] 《秦腔》“找到了一条反抗和突破乡土启蒙叙事传统的方式,找到了一条让‘自我成为自我,乡土成为乡土’的方式”^[30]。在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下,乡土农村常处于一种隔阂、游离状态,而《秦腔》对乡土的原生态记录,构建了一种平等、藏污纳垢的乡土,拓展了乡土叙事的新伦理。《秦腔》“密实的流年式”的叙事艺术既成为当代长篇小说乡土叙事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成为贾平凹长篇小说艺术接受的一个既定视野。

此外,中外比较视野,古今比较视野,也继续丰富着读者对《秦腔》的理解视阈。

三、《山本》问题

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推出。与贾平凹的其他小说一样,《山本》的问世同样受到了众多批评家的关注,一些批评者高度赞扬小说的价值,但另一些批评者却强烈质疑《山本》的艺术魅力,并就其中所暴露的贾平凹创作中早已存在的创作顽疾以及读者的时代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面看来,这种质疑有“泼冷水”之嫌,实际上,这些质疑之声早已存在于贾平凹的其他小说研究中,只不过在《山本》中,这些问题得到了集中的展现。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本》问题”。

问题之一:《山本》之失。《山本》是贾平凹最新推出的第16部长篇小说,刚一出版就引发了包括学界和媒体在内的大量赞誉^④,但随后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与《废都》不同的是,此次的质疑声,并非来自官方或某种力量的施压,而是批评家出于对《山本》的解读与对贾平凹创作得失的思考,出于对近年来一些批评家所暴露出的无原则批评的时代病相的检讨,是“去泡沫”“挤水分”,其学理性也得到不少读者的认可与呼应。归纳起来,《山本》之失主要有三点:一是文本缺乏新意。有学者直截了当地说:“《山本》乍一看,像《白鹿原》;再一看,秦岭游击队的情节又像他自己的《病相报告》和《老生》;而井宗秀治涡镇,颇有几分他早期《晚雨》的情景。《山本》的故事并无太多新意,它甚至只是一部被刻意拉长的《老生》。与《老生》相似,《山本》再次重蹈了将历史简化为无聊的阴谋与血腥、荒诞的暴力和杀戮的覆辙。对此类题材,贾平凹已然驾轻就熟:《白朗》《美穴地》《五魁》等‘匪事’小说就是如此。这种重写20世纪‘野史’的做法,并没有提供全新的历史哲学。”^[30]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山本》在人性关怀上,历史观上,人物塑造上等,暴露了作者思想观念和创新艺术上的缺失^[31]。二是情节模式雷同。这不仅是说《山本》与其他作品有相似性,即便与贾平凹自己的作品也有很高的相似度。难怪有学者说,《山本》“在叙事模式和不少细节描写上还较多地沿袭了贾平凹之前的作品,并映射出时代文学潮流的较大影响,缺乏足够的创新和自我突破”^[32]。还有论者也觉得,形式上,《山本》也有“模仿、拼凑、重复”《三国演义》《水浒传》《白鹿原》等之嫌,在故事的情节、细节和话语上也有太多的自我重复^[33]。三是格调不高。其实,作为贾氏小说的长线读者和研究者都能明显感觉到贾平凹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观念的陈旧、嗜“脏”与“性”以及格调不高等问题,《山本》也不例外。有学者就谈到《山本》暴力描写的过多和情感的冷漠超然,缺乏深层的人文关怀和悲悯,缺乏对世道人心的判断,缺乏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历史观、人伦观也

陈旧落后,尤其是存在女性观消极陈腐、价值观虚无的问题^{[32][33]}。究其因,或与贾平凹浅薄狭隘的写作观念有关^[30]。其实,类似的批评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以《废都》和《高老庄》为代表,指出贾氏创作中的诸多矛盾问题,如,在自我与作品间,“作者大于作品,作者的主观情绪大于作品主人公所能提供的情感依据”;在形象与理念间,作品的意念大于形象,使得“戏不够,理念凑”;在形而上与神秘主义间,“神秘的表象与肤浅的内涵的不相称”;在女性理想与男权主义间,“或隐或显地存留着齐人之福的旧梦”,“在对女性的尊重和理想化的表象后面,隐藏着的是男性的欲望,是男权主义的目光”,等等^[34]。只可惜,这些有益的批评并没有引起贾平凹的关注。从1999年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看出,这些顽疾一直存在于其小说创作之中,批评的话语在时隔20年的今天居然依然适用,这不能不引起批评界以及作者本人的必要的重视和真切的反思。

问题之二:学界无原则批评的时代病相。进入消费时代以来,文艺界弥漫着表态批评、老好批评、红包批评、圈子批评等批评风气,很少有真实而坦诚的交流意见,即便是明知某人某作问题多多,依然回避问题,并不直言道破。正所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就一步步由‘批评’而‘表扬’,由‘表扬’而‘广告’,完成了自身的退化”,批评的站位上“当下几乎所有的批评都站在了作家而不是作品的立场,更进一步说,是站在了资本、市场、利益的立场上”,“批评变成了创作的附庸,批评家也相应地变成了作家的附庸”,这种批评的变异反映了“文学界的圈子化,甚至江湖化问题”。^{[35][33]}就贾平凹的《山本》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当有学者深感于自己阅读《山本》的感受——“叙事琐碎拖沓,细节粗糙造作,感官放纵无度”“立论消极陈腐”,展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理念大于内容、叙事逻辑断裂、价值观的虚无等通病,进而呼吁“守卫文学的尊严”时^[33],对于匡正批评界的时代病相,无疑有着积极的警世意义。

四、问题与思考

35年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许多学术见解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我们以“《废都》现象”“《秦腔》视阈”和“《山本》问题”为中心来探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研究,其中的问题仍有待于我们再思。

比如,“《废都》现象”。经过岁月的过滤、沉淀,由17年前的严厉批判到10年后的热烈赞扬,批评界对《废都》态度的大逆转,体现了时代语境的变化、批评话语的变化,表明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成熟,以及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历史和读者的阅读趣味。这是认知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在《废都》批评中,一些批评者起始强烈否定,后来又高度赞扬,这种前后迥异、判若两人的批评立场与批评姿态,令人不禁感慨批评者的风骨。而一些人见风使舵,甚至落井下石,更说明历史的教训与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汲取。

再如,“《秦腔》视阈”。《秦腔》是继《废都》之后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获得了一系列文学大奖,引发了学界的持续热评,但学界多将视野集中于“传统(乡土)文化”和“叙事艺术”的研究视阈中,是否显得过于狭窄?《秦腔》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多的联系,但同样与世界文学也有更多的联系,评论者对于作品中的各种世界性因素或视而不见,或阐释缺乏独到的视角和深入的探析,对《秦腔》在贾氏小说谱系中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更缺乏贯通性的追索,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批评者还需要进一步打开视野,从更广阔的批评视阈中发掘其价值与意义呢?只有不断地洞开研究的新视阈,我们才能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认知,才能更进一步认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意义。这也是文学批评者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最后,“《山本》问题”。《山本》问题归根结底暴露出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批评的意义,二是时代的病相。对于前者我们不禁要问:批评究竟有何意义?

批评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作家？甚或就没有影响？批评是否就是批评家自己自言自语的文字游戏？就《山本》而言，之所以出现两极化的批评现象，与贾平凹在文本中出现的顽疾为人所诟病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积年所形成的“《山本》之失”用“批评的力量”来谈批评家的意义已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无法断定批评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贾平凹的创作，也无法断定贾平凹之后的创作会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山本》问题”，但我们仍希望“《山本》问题”能成为最后的“问题”，让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真正得以发扬光大。对于后者，我们也不禁要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批评生态？不可否认，作家辛辛苦苦地写出几十万字的长篇，无论编辑、出版社，无论市场、读者，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收获。但以浓烈的商业炒作为先导，以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为其造势，动辄冠之以“杰作”“伟大”等溢美之词，表面看来，作者、编者、出版商与部分批评家（含读者）四方在小说出版之际得到了期望的预期值，但一旦文本的实际与众多的批评家（含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不符合，甚至产生严重的落差，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难道仅仅由读者买单吗？不能不说，我们的批评生态出了问题。也不能不说，我们需要健康的批评生态，需要负责任的文学批评，需要实话实说、真诚坦言的文学批评。也许，这需要时日，但这也正是我们大家所要扭转和努力的。

注释：

①如，栾保俊. 不值得评价的评价——《废都》读后感[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4, (2): 87-88; 艾辛. 评《废都》[J]. 湖南社会科学, 1994, (4): 75-81.

②查知网可知, 1996-2005年10年间,《废都》的评论文章都在个位数上徘徊。

③依据知网统计, 2005-2012年这8年间, 共发表关于《秦腔》的论文218篇, 年均27.25篇, 为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的最高平均值。2011年《火炉》与2013年《带灯》的出版, 略略冲淡了《秦腔》的研究, 但年均也在15篇以上(不含报纸报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④2018年3月《收获》长篇专号春卷全文发表; 4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简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精装本; 小说刚一问世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了贾平凹参与的研讨会; 5月, 商洛学院承办了“第二届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 重点讨论了贾氏新作《山本》;《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重要媒体对此有专题报道; 评论界包括《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争鸣》在内的重要学术期刊登载了大量有关《山本》的评论文章; 央视《朗读者》节目做了一期贾平凹《山本》的节目。这些热评都从不同角度高度肯定《山本》的成就和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 [1]雷达. 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6): 20-28.
- [2]陈骏涛, 白桦, 王绯. 说不尽的《废都》[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6): 36-45.
- [3]陈晓明. 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J]. 天津社会科学, 1994, (2): 61-67, 74.
- [4]韩鲁华. 世纪末情结与东方艺术精神——《废都》题解[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6): 54-59, 53.
- [5]李洁非. 《废都》的失败[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6): 29-35.
- [6]田秉锷. 《废都》与当代文学精神滑坡[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3, (4): 54-55.
- [7]张法. 《废都》: 多滋味的成败[J]. 文艺争鸣, 1993, (5): 50-52.
- [8]李书磊. 序: 压根就没有灵魂[M]//多维编. 《废都》滋味.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9]中国文学经典编写组. 中国文学经典: 贾平凹《废都》[M].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0.
- [10]陈晓明. 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 (3): 4-17.
- [11]鲁晓鹏, 季进. 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 (3): 77-82.
- [12]王尧. 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 (3): 18-26.
- [13]丁帆.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J]. 文学评论, 2014, (3): 115-124.
- [14]朱寿桐. 贾平凹与当代小说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J]. 小说评论, 2016, (2): 4-11.

[15] 李敬泽. 庄之蝶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 (5): 14-20.

[16] 陈波. 论《废都》的哲学思辨主题[J]. 小说评论, 2011, (S2): 28-30.

[17] 宋旭. “实现”与“未实现”——《日瓦戈医生》和《废都》中情感内核的相异性[J]. 理论界, 2018, (11): 93-101.

[18] 李星. 当代中国的新乡土化叙述——评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J]. 小说评论, 2005, (4): 71-75.

[19] 贾平凹. 秦腔后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20] 陈晓明. 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J]. 文艺争鸣, 2005, (6): 12-18.

[21] 李伟. 论近年来贾平凹小说中的家庭伦理——以《秦腔》《高老庄》《土门》为例[J]. 文艺争鸣, 2014, (3): 164-170.

[22] 陈思和. 再论《秦腔》: 文化传统的衰落与再返民间[J]. 扬子江评论, 2006, (1): 12-16.

[23] 李贵仁. 《商州》得失谈[J]. 文学家, 1984, (5): 111-116.

[24] 吴义勤. 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秦腔》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 (4): 74-82.

[25] 李建军. 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J]. 文艺争鸣, 2005, (4): 39-47.

[26] 黄平. 无字的墓碑: 乡土叙事的“形式”与“历史”——细读《秦腔》[J]. 南方文坛, 2011, (1): 62-64, 69.

[27] 谢有顺. 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 (5): 4-17.

[28] 张学昕. 回到生活原点的写作——贾平凹《秦腔》的叙事形态[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 (3): 4-17.

[29] 李勇. 新世纪大陆乡村叙事的困境与出路——由贾平凹的《秦腔》《高兴》谈起[J]. 文艺评论, 2012, (7): 37-41.

[30] 周思明. 《山本》的老毛病与新问题[J]. 文学自由谈, 2019, (2): 45-51.

[31] 江腊生. 回归中国叙事传统的诸种可能——论小说《山本》的文化追求[J]. 文学评论, 2018, (6): 83-90.

[32] 贺仲明. 思想的混乱与自我的复制——对《山本》文学价值的重新考量[J]. 南方文坛, 2019, (2): 101-108.

[33] 鲁太光. 价值观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J]. 文艺研究, 2018, (12): 25-34.

[34] 张志忠. 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 当代作家评论, 1999, (5): 50-57.

[35] 鲁太光. 有山无本一地鸡毛——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的讨论[J]. 长江文艺评论, 2018, (4): 81-86.

Phenomena, Issues and Reflection of Research on Jia Pingwa's Novels:

On "Ruined City Phenomenon", "Perspectives on Shaanxi Opera" and "Shanben Issue"

Chen Siguang

Abstract: "Ruined City Phenomenon", "Perspectives on Shaanxi Opera" and "Shanben Issue" are three significant key points in research on Jia Pingwa's novels. Centering on the three point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a and issues of research on Jia Pingwa's novels. In terms of criticism of *Ruined City*, this novel got both praise and blame and it was banned and reevaluated. During the ups and downs, some critics gav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evalu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past, which made people question their prides. With respect to "Perspectives on Shaanxi Opera",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rrative art are the two main perspectives. But the lack of global factors means we need to widen our research horizons. "Shanben Issue" shows weakness in Jia Pingwa's early works and readers' urban disease. The formal makes us reflect the significance of criticism, and the latter warns us that we need fair, responsible and honest criticism.

Key words: "Ruined City phenomenon"; "perspectives on Shaanxi Opera"; "Shanben issue"; Jia Pingwa; research on novels